

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看“中国梦”^{*}

◎ 张 军 魏 清

摘 要：“中国梦”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追求，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情景的整体感知、辨别与顿悟，对中国精神的彰显。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向的“中国梦”，融合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体现了说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是实践与智慧的统一。立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解读“中国梦”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我们从根源和本质上认清“中国梦”的理论旨趣，对于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实践智慧 中国梦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此后，在多次讲话中又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实践智慧的角度来看，“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概括，是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标志着党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是新时期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

实践智慧是从实践的角度探讨智慧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最明确论述这一概念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德性就是理性(logos)”，实践智慧指的是知识与德性的统一，实践智慧就是一种有德性的知识或有知识的德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实践智慧”这一概念，并区分了人类认识事物和表述真理的五种能力，他在肯定实践智慧的本质是践行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同于普遍性知识的特点。

首先，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实践智慧的五个特征：“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善于正确考虑的人，谁也不会去考虑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和他无能力去做到的事物。践行的领域是可以改变的。”^②也就是说，实践的主体应当是具有正确认识的，并且实践的对象应该是可以改变的；“在可改变的事物中我们要区分制作和践行，制作和践行是两种不同的活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科学到哲学——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19NDJC284YB)阶段性成果；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批判话语的当代延续——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2015N144)结题成果。

动……旨在践行的活动不同于旨在制作的反思活动”。^③也就是说,实践智慧是一种不同于生产或制作的践行活动;“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人善或不善的事物,因为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④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具有目的性,而且其本身就是目的;“所谓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正确考虑对自身的善或有益的事,但这不是就部分意义而言……而是就整个意义而言,指对于整个善良而幸福的生活有益”。^⑤也就是说,实践智慧具有善的目的,具有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旨归;“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东西的知识,它更应当通晓个别事物,因为他的本质是践行,践行必须与个别事物打交道,从而许多人虽然对其能力没有科学知识,但干起来比起那些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出色,其他领域也这样,都是具有经验的人占先。”^⑥也就是说,实践智慧不仅关注普遍知识,也关注特别事物的知识,尤其注重经验的作用。

其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纯粹科学、技术或应用科学与实践智慧的区别。一方面,纯粹科学研究的是不可改变的东西,“科学所认识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凡是出于必然的东西,当然能被科学地认识,凡是出于必然而存在的东西,当然无条件永恒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既不能生成也不能灭亡”,而实践智慧研究的是可改变的而且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物;纯粹科学追求的是单纯的真理,实践智慧关注的是人的具体生活,追求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善”。另一方面,实践智慧与技术或一般的应用科学在本质上也有所不同。技术的本质是制作或生产,而实践智慧的本质是践行;技术是工具或手段,其目的存在于制作或生产之外,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它关心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实践智慧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它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践行的领域是可以改变的;它所以不是技术,是因为践行和制作种类不同。所以结论是,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善或不善的事物。因为在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⑦

概而言之,实践智慧也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是那些对人类有益或有害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它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制作智慧”。两者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但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于生产对象的可塑性。同时,实践智慧表征了那些知道怎样生活得更好的人,是一种走向善的行动趋向,具有技术倾向所缺乏的道德意识,而且实践智慧和道德品性是一种互惠关系。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现实的实践之中,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人与世界的互动。一方面,人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改造世界,正是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主体的建构,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在此,解释世界与“是什么”相关联,内含了人对世界的经验知识,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表达;改变世界则内含了“应当成为什么”的价值关切,主要是一种实践理性的体现。相比之下,在实践智慧中,“是什么”的理论理性与“应当做什么”的实践理性获得了统一: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提供现实的根据,而实践理性则为理论理性提供价值引导。与之相

联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也获得了辩证的统一,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前提,而改造世界的历史需要则为认识世界提供内在动力。简言之,“以变革世界的实践关切接引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以解释世界的理论观念范导对世界的实践变革,构成了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⑧“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承载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伟大历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似锦。“中国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之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世界文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恢复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更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复兴是针对曾经的衰落而言的,正因为我们有过往日的辉煌,也有过曾经的屈辱,所以才会有复兴的宏愿。正是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才提出了复兴的梦想,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梦想提出的理论前提;同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好愿望也为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实践接引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刻解读,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引导伟大复兴的实践变革,体现了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了新一代党的领导人的实践智慧。

其二,“实现人民幸福”体现了价值追求与价值追问的统一。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既体现于了解何物对自我是有益的,同时也涉及“合乎逻辑的、真实的能力形态”,并以此“为人的利益而行动”。^⑨同时,实践智慧应该指向“一种好的生活”,并关注“总体上的有益生活”。^⑩在此,合乎逻辑体现了实践的理性品格,而“为人的利益而行动”则内含了实践的价值诉求,它以改造世界并使之合乎人的发展需要为目标,体现了说明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同时,基于存在的本源价值,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更加善于考虑“总体上的有益”,而不仅仅限于特定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时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改善民生,打好复兴之基,共筑中国梦。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几十年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党和政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始终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行动原则,以改善民生为宗旨,将全体人民的“有益生活”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始终,旨在使全国人民过上“一种好的生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体现了实践的理性品格,同时也内含了实践的价值诉求,是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实践智慧在价值目标上主要体现为成己与成物。成己是指个体的自我完成与群体的价值实现;成物旨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以成己与成物为内容的实践智慧,内含了“应当做什么”的价值追求和“为何应当做”的价值追问的辩证统一。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实践智慧的目标指向往往有所不同,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关注个体的完善与群体价值的实现。“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⑩“个人梦”和“国家梦”有着内在的联系，个人的奋斗离不开国家，“个人梦”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梦”的实现；同时，“国家梦”的实现又有赖于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个人梦”是“国家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⑪同时，“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⑫在此，“中国梦”既关注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也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成就祖国伟大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个人的梦想，而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追求与价值追问的辩证统一。

其三，“坚持中国道路”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实践的目的决定了实践的方向和途径。方向与价值取向相关联，体现的是价值理性；途径与方式方法相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层面的考虑。在实践智慧中，两者呈现为彼此交融的形态，两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同时也是根据目的选择手段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说：“实践智慧使我们选择正确的手段。”“没有实践智慧，选择就不可能正确，正如没有德性，选择就不可能正确一样。”^⑬因此，我们可以说，目的与手段的沟通过程就是实践智慧在思维过程中的实现过程。同时，目的中的价值原则暗含了普遍性的内涵，而手段的具体运用则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联。实践目的的实现无疑需要普遍性观念的引导，但是，由于实践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实践的背景和境遇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何实现普遍的原则规范与具体情境的协调沟通，是需要诉诸实践智慧的。在实践智慧中，一般原则的抽象性和教条化得以扬弃，在特定的情境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特定品格，同时，经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得以克服，在一般的原则下获得自觉的品格。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实践智慧不仅考虑普遍，而且考虑特殊，后者由经验为人所熟知。”^⑭黑格尔也认为：“为了能够实现，善还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⑮在此，特殊化同样蕴含着普遍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现实化问题。伽达默尔在论及实践知识时也提到实践知识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⑯可见，实践智慧具有沟通一般原则与具体情境的内在特点。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发展战略，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新时期，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结合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实践表明，“中国梦”作为普遍观念，其抽象化得以扬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获得了具体的内涵与特定品格；同时，在“中国梦”的规范指引下，中国道路避免了自发性和盲目性。以中国梦为规范引导，以中国道路做实践路径，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决策的实践智慧。

其四，“凝聚中国力量”体现了价值追问和价值主体的统一。在谈到实践智慧的特点时，亚里士多德指出：“那些理性的形态都可能被遗忘，而实践智慧不可能被遗忘。”（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0b25）^⑰理性的形态与具体的知识经验相联系，实践

智慧则表现为“知的能力”，它形成于现实的实践过程，同时内在于实践主体之中，具体化为人的存在规定，制约和影响人的实践过程。同时，实践智慧呈现出综合的特点，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与德性相关。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德性。”^⑩这里的德性既有本体论的意蕴也有价值论的内涵，既可理解为与人同在本体论规定，也呈现出一种善的品格。就实践过程而言，它需要主体之间观念上的沟通与理解，行动中的协调与配合。实践目标的确认、实践计划的制定，在实际行动之前都属于观念层面的形态，与之相关的一致和共识也属于观念层面的沟通。要实现这种沟通，既需要倡导者的引导与说服，也需要参与者的理解与接受，而这些都是以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之间的关联为前提、以实践主体之间的沟通为基点的。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环境，如何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以协调不同实践主体的行动，同样离不开实践智慧。以沟通“应当做什么”与“应当如何做”为内容，它是协调实践主体活动的内在依据。可见，无论是观念层面的理解与沟通，还是行动中的协调与配合，都内含了实践智慧。“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13亿中华儿女的力量，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的梦，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各阶层的同心同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为此，党中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⑪以上各种原则和指导方针显示了党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党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同时，为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而采取的各种发展战略，实现了“做什么”与“如何做”的沟通，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供了内在依据。“中国梦”的提出为不同主体之间的观念沟通提供了思想支撑，同时保证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而这些都是实践智慧的指导之下做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以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向的“中国梦”，是在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追求，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情景的整体感知、辨别与顿悟，是对中国精神的彰显，融合了理论理性（认识功能）和实践理性（意志功能），体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其中，既包括“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也内含“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既关注“是什么”理论追求，也注重“怎样做”的价值追问。基于发展的理念，“中国梦”既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注重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将普遍的理论指引与具体的情景分析相结合，展现了独特的方法论取向。同时，作为德性与能力相统一的中国梦，始终以人的存在与发展作为本体论前提，内在于人并与人同在。可见，中国梦的理论旨趣，意在将价值取向、知识经验、行为方式和存在者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为统一的观念性形态并凝结于中国人心目中，并通过特定的实践方式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基础，它具有实践与智慧的双重品格，是实践与智慧的统一。

注释:

①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2012年11月29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19744088)

②④⑦⑨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p. 1026 - 1027.

③⑤⑩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6.

⑥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8.

⑧ 杨国荣:《论实践智慧》,《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6页。

⑪⑫⑬⑭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3年3月18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0819130)

⑮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p. 1034 - 1036.

⑯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30.

⑰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7页。

⑱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6页。

⑲⑳ Richard 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1941, p. 1027.

(张军,男,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魏清,女,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外语与课程思政)